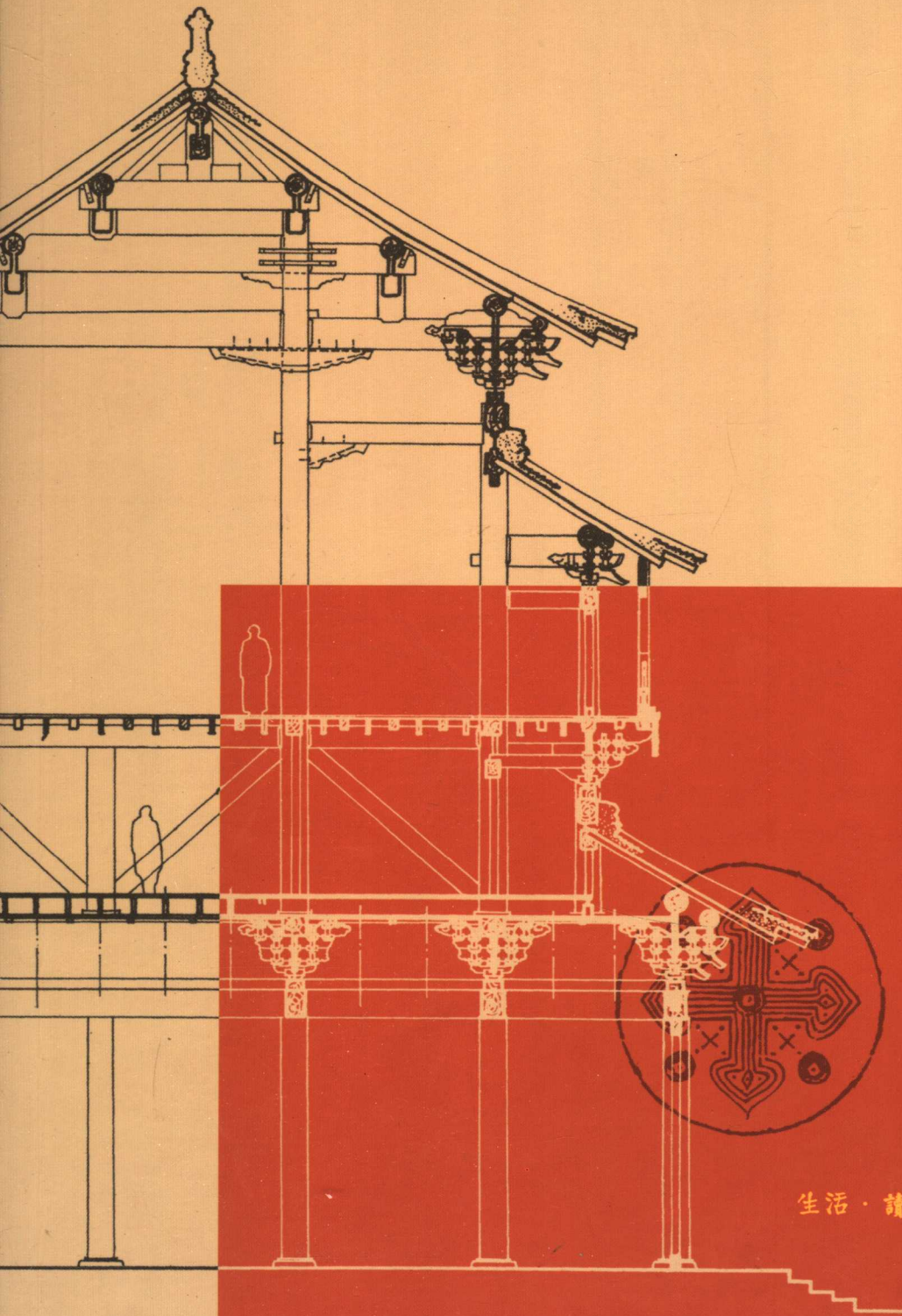


建筑文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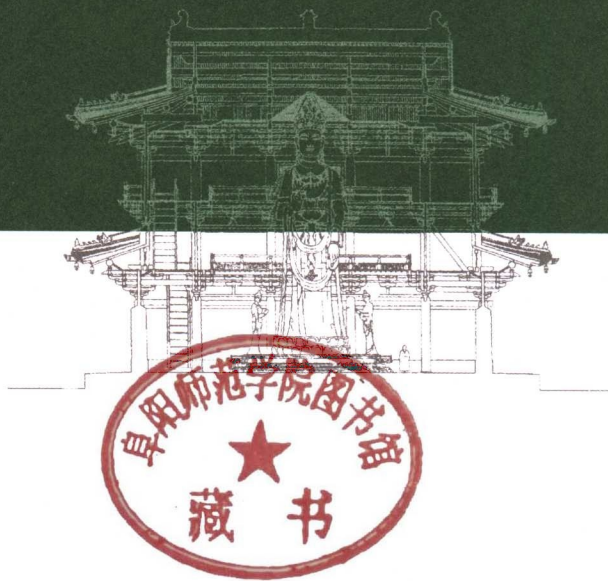
梁思成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建筑文萃

梁思成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筑文萃/梁思成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3

ISBN 7-108-02026-2

I. 建… II. 梁… III. 建筑学—文集
IV. TU-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3315号

建筑文萃 梁思成 著

责任编辑 张志军

装帧设计 宁成春

电脑制作 1802工作室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3月北京第1版

200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7.5

字 数 550千字

印 数 0,001—7,000册

定 价 52.00元

梁思成(1901—1972)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建筑大师。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建筑事业,在古建筑研究、建筑理论、建筑教育、城市规划、古建筑保护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以他在中国艺术与建筑方面的成就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世纪50—60年代,他以其渊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撰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理论论文与科普性的随笔。他的作品已编入《梁思成全集》(共九卷)。

本书重点编选了城市规划、古建保护、建筑理论等方面的文章,三十余篇。建筑界业内人士、青年学生以及文化爱好者,都是本书的读者对象。

目 录

前 言	1
城市规划	5
市镇的体系秩序	6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10
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30
《城市计划大纲》序	41
《苏联卫国战争被毁地区之重建》译者的体会	44
致聂荣臻信——关于北京市规划工作及北京市招聘建筑人才问题	48
致周恩来信——请求早日确定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问题	50
致周恩来信——关于基本建设的两点建议	51
致彭真、聂荣臻、张友渔、吴晗、薛子正信 ——关于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机构、任务、人选问题	53
古建保护	55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56
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	108
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	193
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	208
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	214
关于敦煌维护工程方案的意见	218
闲话文物建筑的重修与维护	219
建筑教育	227
致梅贻琦信——关于在清华设立建筑系的建议	228
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现称建筑工程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	230

谈“博”而“精”	238
----------------	-----

建筑理论	241
-------------------	-----

致彭真信——关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问题	242
致朱德信——关于建筑设计的民族形式问题	246
致车金铭信——关于湖光阁设计方案的建议	248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	251
建筑的民族形式	255
祖国的建筑传统与当前的建设问题	260
建筑艺术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民族遗产的学习与运用的问题	267
今天学习祖国建筑遗产的意义	277
从“适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谈到传统与革新	282
建筑创作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292
建筑和建筑的艺术	304
拙匠随笔（一）建筑C（社会科学U技术科学U美术）	313
拙匠随笔（二）建筑师是怎样工作的？	316
拙匠随笔（三）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	319
拙匠随笔（四）从“燕用”——不祥的谶语说起	322
拙匠随笔（五）从拖泥带水到干净利索	325
《中国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	328

建筑史	333
------------------	-----

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	334
我国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	338
古建序论	346
中国建筑的特征	360
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	366
中国的佛教建筑	388
《中国古代建筑史》（六稿）绪论	410

前言

在这本《建筑文萃》梁思成的选集出版前夕，编者嘱我写一个前言，我很赞成出版这本文选，谨在此作简要的介绍。

两年前，为了纪念我国建筑界一代宗师梁思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经过编者的精心校阅和努力收集佚文，编辑出版了《梁思成全集》，使我们得以进一步研究和继承这一笔宝贵的学术遗产和精神财富。《全集》的篇幅大，册数多，印数也有限，不便于普及和传播。为此，现在编辑出版这一本包括梁先生在建筑学有关诸领域学术思想的选集，着重收集了梁先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和解放后发表的关于城市规划、古建筑保护、建筑理论和设计等方面的文章和信函，希望能为广大的建筑工作者和社会各界读者提供阅读研究的方便条件。这本选集并未收集那些只供少数专家研究的专著和科研报告，倒是收集了不少梁先生为报刊写的科普作品，所以也适合于有兴趣了解和欣赏建筑艺术的读者阅读。

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先生在《梁思成全集》的引言中曾说：“1932年梁（思成）、林（徽音）在《平郊建筑杂录》一文中提出了‘建筑意’（architecturesque）的概念，敏锐地注意到中国建筑的场所意境，这比西方的诺伯舒兹（Norberg Schulz）提

出的‘场所精神’（genius loci）要早几十年，可惜未有进一步的后续研究。”这是一个很好、很有价值的评价。我们可以作如下的引申：我们并不是画家，但是我们可以欣赏绘画，因为它有“画意”（picturesque）；我们并不是诗人，但是我们可以欣赏诗歌，因为它有“诗意”（poetic）。因此，我们如果不是建筑师，但是我们也可以欣赏建筑（architecture），因为它有“建筑意”。其实，有的时候建筑不仅有建筑意，也有画意，也有诗意。在西方古代，建筑、绘画和雕塑并称为三艺，建筑被称为三艺之母，因为有名的绘画和雕刻正是满布在大教堂的里里外外，相互融为一体。中国古代的壁画和雕塑也是画和塑造在寺庙和石窟之中的。建筑，或称建筑艺术，也是可供人们欣赏的艺术门类之一。这本选集可以帮助读者增加对建筑学内容的了解和认识，这也是很有意义的。梁先生在给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的信中曾说：“非得社会对于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如社会破除（对建筑）的误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建筑，然后才能发挥你们的创造力。”由此可见，对社会普及关于建筑的认识，与建筑水平的提高具有密切的依存关

系。实际上,在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伦敦,社会公众对那些损害历史建筑环境的高大建筑的强烈批评和抵制,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和效果。而业主对规划设计的要求和其鉴赏水平的高低,对于建筑设计具有很大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一个建筑设计的成败,不仅取决于设计者,在相当程度上往往取决于业主。由此可见,普及和提高社会对于建筑的认识有重要的意义。

梁思成先生的学术造诣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对近代建筑教育、建筑史学、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理论以及历史文物的保护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先驱。他的许多观点和主张的正确性、先进性、预见性和宝贵的价值,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日益为历史的发展所证实。

在城市规划方面,梁先生在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前就已开始研究。他于1945年8月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了《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于城市 and 城市规划的认识以及采用“有机性疏散”(organic decentralization)的原理来处理大城市病等主张,为战后我国城市的重建和发展出谋划策。全国解放以后,他担任了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并在1950年与陈占祥先生一起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这是他运用“有机性疏散”的原理,为北京旧城的保护和新区的发展做出的深谋远虑的擘划,其中也系统地体现了梁先生关于城市规划的学术思想和主张。北京的旧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世界历史名城,梁先生在《建议》中做了精辟的概括:“北京城之所以以艺术文物而著名,就是因为它原是有计划的壮美城市,……北京的建筑形体同它

的街道区域的秩序都有极大的艺术价值,非常完美。所以北京旧城区是保留着中国古代规划,具有都市计划传统的完整艺术实物。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罕贵无比的。”他还在《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护》一文中说:“北平是现在世界上中古大都市之孤本。”这是因为经过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迅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著名的中古时期的大城市已把原有的城墙、城堡及护城河相继拆毁,而中国当时由于相对落后,尚未经过工业化的突变,北京的城墙、城楼和箭楼、环城的护城河以及城内的皇家宫室、园囿、坛庙和富有特色的四合院居住区,都还是相当完整,如果能够全部保存下来,那的确是举世无双的瑰宝,它们将作为中华民族具有高度智慧和创造力及灿烂的古代文明的见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这是举世公认的,并非我们自我吹嘘。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学者爱德蒙·培根教授(Edmund.N.Bacon)在他的名著《城市的设计》一书中的论述可以为证。他说:“北京可能是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最伟大的单个作品。……它的设计是这样的光辉,为我们今天的城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

梁先生在城市规划中保护北京旧城的主张,现在已广为社会各界所了解和认识。但也可能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梁先生的城市规划就是保护古建和旧城。其实这只是他的主张中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而不是他的规划思想的全部。在他和陈占祥先生提出的《建议》中,还为北京的发展做出了合理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规划,也是他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中所阐述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发展和应用。在这两篇著作中他系统地阐发了城市规划的基本原理、目标、方法和模式,这是梁先生深入

研究西方近代和中国古代的学术成果和遗产、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集中体现了他的深思熟虑和远见卓识，对我们今天的工作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建议》运用“有机性疏散”的原理把北京的旧城以外的新发展区，分为若干个“基本工作区”，在“基本工作区”内不但有工作地点，还有工作人员的住宅、学校、商店、体育场等各种服务设施。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self-contained community），是一个“小市镇”或一个“区”，是按照“有机性疏散”原则布置的健全的有机体，它便利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减少上下班交通之苦，也减少城市的交通量和相应的污染。这是“混合的功能分区”。1977年的《马丘比丘宪章》在功能分区概念问题上，纠正了1933年《雅典宪章》为了追求城市空间结构分区清晰而牺牲城市的有机构成的错误，提倡创造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建议》纠正这个错误比《马丘比丘宪章》要早20多年。

从《建议》的附图可以看到，在旧城的两侧，布置了两个重要的“基本工作区”，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一个是商务区，这就是按照“有机性疏散”的原理布置的三个中心，这样的多中心实比一个中心优越，这是先进的规划思想，不但保护了旧城，而且为新的行政中心和商务区安排了良好的位置和充足的用地，不仅功能合理，使用方便，而且互相陪衬，宏伟壮观，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首都的要求。这正是梁先生所说的“古今兼顾”，“新旧两利”，而不是把三个不同功能的中心叠加在一起，集中在一起，造成拥挤和凌乱，以至“劳民伤财，两败俱伤”。

梁先生在《市镇的体系秩序》一文中

提出城市规划建设的最高目的，“在于使居民得到最高度的舒适，在使居民工作达到最高效率，这就是古谚所谓的使民‘安居乐业’四个字。”我们不能把这朴素的语言视为老生常谈，它所包含的是城市规划建设的最基本要求，也是最难实现的最高目标和指导方针。如果以它作为考核政府政绩的基本指标，那我们今天就不会有那么多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了。

梁先生是用现代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先驱之一，他在这个领域的成就世所公认，这里不需赘述。他也是我国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保护的先驱。他的文物保护思想是一笔宝贵的遗产，他所提倡的“整旧如旧”思想现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这就避免了把文物修缮得“面目全非”而损害其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新闻里也少有再把破坏文物真实性的做法称颂为修理得“焕然一新”的报道了。梁先生在审查西安小雁塔的修缮方案时说的话更为精辟而准确，他说：“保护古建筑是要使它延年益寿，不是返老还童”，而以《威尼斯宣言》为最高概括的当代文物建筑保护理论，基本思想就是这个要“延年益寿”，不要“返老还童”。梁先生在1932年《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提出了“今后的保护”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三条：宣传，立法和专家负责。这在30年代是很先进的见解。

梁先生还在《建议》中明确提出，保护文物建筑应当保护它的环境：“为北京文物的单面着想，它的环境布局极为可贵，不应稍受伤毁”，“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北京的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抵触。”而直到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才第

一次明确规定保护文物建筑应当保护它的环境：“保护一座文物建筑，意味着要适当地保护一个环境。任何地方，凡传统的环境还存在，就必须保护。凡是会改变体形环境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变动，都是决不允许的。”这是由于一个时期流行在文物周围布置花坛和广场之类的做法，使文物失去了与环境的有机联系，以及“二战”后重建中对老旧建筑大量的拆除的现象，使60年代的学术界对这些做法和现象进行了反思总结。此观点被学术界认为是《威尼斯宪章》的一项重大成就，而梁先生在很早的时候就提出了。

1955年，梁先生由于极力反对拆毁北京的城墙等古建筑，提出限制旧城内新建建筑的高度不得超过三层等意见，并坚持这些主张。这与当时认为修建大马路和楼房是现代化标志的观念发生尖锐矛盾，梁先生的观点被批评为“坚持妨碍城市现代化发展的资产阶级复古主义学术思想”。现在，历史已证明：他的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物的主张是正确的，是极其宝贵的。与此同时，梁先生还由于在建筑创作上主张“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而受到提倡“复古主义”的批判。当时有一些新建筑模仿中国传统建筑屋顶，设计建造了仿古的“大屋顶”，造成铺张浪费，这被认为是梁先生所提倡的“民族形式”造成的。实际上，如果认真阅读研究梁先生的著作，就会看到，他并不认为应当仿古，这些仿古的建筑和仿古的屋顶并不符合他的原意，他曾多次谈过这样的意见，譬如，1950年他就在《建议》中提出：“……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的新的、时代的、民族的

形式，而不是盲目地做‘宫殿式’或‘外国式’的形式主义建筑。我们不惟可以如此做，而且自信可以创造出这种新形体。”后来，在1959年《在住宅建筑标准及建筑艺术问题座谈会的发言》中，他又说，“新而中，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是我在讨论国庆工程的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我所谓‘新’就是社会主义的，所谓‘中’就是具有民族风格的。”他并不赞成做“宫殿式”的仿古建筑，所以说他提倡“复古主义”，实为不实之辞。他所主张的“中而新”，就是用“具有现代的中国特色”来要求我们的建筑创作，这是需要我們加以研究和考虑的，尤其是在今天仿多种西洋建筑形式之风盛行的时候。

对于梁先生的学术思想和理论著述，知其全貌和精神实质的，也只限于在学术上和业务上与他接近的少数人。由于50年代对他的“批判”，梁先生的形象长期被笼罩在“复古主义”的阴影下，至今没有完全消除，由此产生的误解和对梁先生学术思想和理论著述的忽视，都是不利于我国建筑学的健康发展的。这本《建筑文萃》实有助于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梁先生在各个领域的学术思想和成就，了解他为了中国建筑学的发展坚韧不拔的奋斗史，了解他热爱祖国，为了保护古城，坚持正确的主张，不计个人得失，满腔热情奔走呼号的献身精神，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宝贵遗产。

刘小石

2003年8月18日于北京

城市规划



市镇的体系秩序^{*}

● 本文原载1945年8月重庆《大公报》，后刊入1945年10月国民政府内政部主编的《公共工程专刊》第一集。

● 汉高祖定都关中，“起五里于长安……”笔误。此为汉平帝二年（公元2年）事，见《汉书·平帝本纪》。

——王世仁注

● 隋文帝以“京城宫阙之前……”引自宋敏求《长安志》卷七，“唐皇城”注文。

——王世仁注

● 后周世宗营建汴京，……引自《册府元龟》卷十四，“帝王部，都邑二”，显德三年诏。

——王世仁注

● 郝斯曼，G.E. Haussmann（1809—1861），现通译奥斯曼，时任法国塞纳区行政长官。

——王世仁注

凡是一个机构，必须有组织有秩序方能运用收效。人类群居的地方，所谓市镇者，无论是由一个小村落漫长而成（如古代的罗马，近代的伦敦），或是预先计划，按步建造（如古之长安，今之北平，华盛顿），也都是一种机构。这机构之最高目的在使居民得到最高度的舒适，在使居民工作达到最高度的效率，就是古谚所谓使民“安居乐业”四个字。但若机构不健全，则难期达到目的。

使民“安居乐业”是一个经常存在的社会问题，而在战后之中国，更是亟待解决。在我国历史上，每朝兴华，营国筑室，莫不注重民居问题。汉高祖定都关中，“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①隋文帝以“京城宫阙之前，民居杂处，不便放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人居止。”^②虽如后周世宗营建汴京，尚且下诏说“间巷隘狭，多火烛之忧；每遇炎蒸，易生疫疾”。所以“开广都邑，展行街坊”时，他知道这工作之困难与可能遇到的阻力，所以引申的解说，“虽然暂劳，久成大利……胜通览康衢，更思通济。”^③现在我们适承大破坏之后，复员开始，回看历史建设的史实，前望我们民族将来健康与工作效率所维系，能不致力于复兴市镇之计划？

市镇计划（city planning）虽自古已有，但因各时代生活方式之不同，其观念与着重点时有改变。近数十年来，因受了拿破仑三世时巴黎知事郝斯曼^④开辟广直的通衢，安置凯旋门或铜像一类的点缀品的影响，社会上竟误认这类市容的装饰与点缀为“市镇计划”实现之本身，实是莫大的错误。殊不知公元1850年代的法国，方在开始现代化，还未完全脱离中世纪的生活方式。且在革命骚乱之后，火器刚始发明之时，为维持巴黎社会之安宁与秩序，便利炮车骑兵之疾驰，必须拆除城垣，广开干道。在干道两旁，虽建立制式楼屋，以撑门面，而在楼后湫隘拥挤的小巷贫居，却是当时地方官所不感兴趣的问题。

现代的国家，如英美，以人民的安适与健康为前提，人民生活安适，身心健康，工作效率自然增高。如苏联，以生产量为前提，为求生产效率之增高，必先使人民生活安适，身心健康。无论着重点在哪方面，孰为因果，而人民安适与健康是必须顾到的。假如居住的问题不得合理的解决，则安适与健康无从说起。而居住的问题，又不单是一所住宅或若干所住宅的问题，就是市镇计划的问题。所以市镇计划是民生基本问题之一，其优劣可以影响到一个区

域乃至整个市镇的居民的健康和社会道德，工作效率。

中世纪的市镇，其第一要务是保障居民之安全，安全之第一威胁是外来的攻击，其对策是坚厚的城墙，深阔的壕沟为防御。至于工作，都是小的手工业；交通工具只有牛马车，或驮牲与人力；科学知识未发达，对于卫生上所需的光线与空气既无认识，更谈不到设计；高的疾病死亡率，低的生产率，比起防御攻击之重要，不可同日而语，幸而中世纪的市镇，人口虽然稠密，面积却总很小，所以林野之趣，并不难。人类几千年来，在那种情形的市镇里亦能生活，产生灿烂的文化。

但自十九世纪后半以来，市镇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大工业的发达与铁路之建造，促成了畸形的人口集中，在工厂四周滋生了贫民窟（slum），豢养疫疾，制造罪恶。因交通工具之便利，产生了都市中的车辆流通问题，在早午晚上班下班的时候，造成惊人的拥挤现象，因贫民窟之容易滋生，使房屋地皮落价，影响市产价值。凡此种种，已是欧美都市的大问题。而在中国，因工业落后，除去津沪汉港等大都市外，尚少这种现象发生。

但在抗战胜利建国开始的关头，我们国家正将由农业国家开始踏上工业化大道，我们的每一个市镇都到了一个生长程序中的“青春时期”。假使我们工业化进程顺利发育，则在今后数十年间，许多的市镇农村恐怕要经历到前所未有的突然发育，这种发育，若能预先计划，善予辅导，使市镇发展为有秩序的组织体，则市镇健全，居民安乐，否则一旦错误，百年难改，居民将受其害无穷。

一个市镇是会生长的，它是一个有机

的组织体。在自然界中，一个组织体是由多数的细胞合成，这些细胞都有共同的特征，有秩序地组合而成物体，若是细胞健全，有秩序地组合起来，则物体健全。若细胞不健全，组合秩序混乱，便是疮疥脓包。一个市镇也如此。它的细胞是每个的建筑物，每个建筑物有它的特征或个性，特征或个性过于不同者，便不能组合为一体。若使勉强组合，亦不能得妥善的秩序，则市镇之组织体必无秩序，不健全。所以市镇之形成程序中，必须时时刻刻顾虑到每个建筑物之特征或个性；顾虑到每个建筑物与其他单位间之相互关系（correlation），务使市镇成为一个有机的秩序组织体。古今中外健全的都市村镇，在组织上莫不是维持并发展其有机的体系秩序的。近百年来欧美多数大都市之发生病征，就是因为在社会秩序经济秩序突起变化时期，千万人民的幸福和千百市镇的体系，试验出了他们市镇体系发展秩序中的错误，我们应知借鉴，力求避免。

上文已经说过，欧美市镇起病主因在人口之过度集中，以致滋生贫民区，发生车辆交通及地产等问题。最近欧美的市镇计划，都是以“疏散”（decentralization）为第一要义。然而所谓“疏散”，不能散漫混乱。所以美国沙理能（Eliel Saarinen）教授提出“有机性疏散”（organic decentralization）之说。而我国将来市镇发展的路径，也必须以“有机性疏散”为原则。

这里所谓“有机性疏散”是将一个大都市“分”为多数的“小市镇”或“区”之谓。而在每区之内，则须使居民的活动相当集中。人类活动有日常活动与非常活动两种：日常活动是指其维持生活的活动而

言,就是居住与工作的活动。区内之集中,是以其居民日常生活为准绳。区之大小以使居民的住宅与工作地可以短时间——约二十分钟——步行达到为准。在这区之内,其大规模的工商业必需的建置,如学校、医院、图书馆、零售商店、菜市场、饮食店、娱乐场、游戏场等,在区内均应齐备,使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市镇”。在区与区之间,设立“绿阴地带”,作为公园,为居民游息之所。务使一个大都市成为多数“小市镇”——区——的集合体,在每区之内将人口稠密度以及面积加以严格的限制,不使成为一个庞大无限量的整体。

现在欧美的大都市大多是庞大的整体。工商业中心的附近大多成了“贫民区”。较为富有的人多避居郊外,许多工人亦因在工作地附近找不到住处,所以都每日以两小时的时间耗费在火车电车或汽车上,在时间、精力与金钱上都是莫大的损失。伦敦七百万人口中,有十万人以运输别人为职业(市际交通及货物运输除外),在人力物力双方是何等的不经济。现在伦敦市政当局正谋补救,而其答案则为“有机性疏散”。但是如伦敦纽约那样的大城市,若要完成“有机性疏散”的巨业,恐怕至少要五六十年。

现在我们既见前车之鉴,将来新兴的工商业中心,尤其是工业中心,必须避蹈覆辙。县市当局必须视各地工商业发展之可能性,预为分区,善予辅导,否则一朝错误,子孙吃苦,不可不慎。

至于每区之内,虽以工厂或商业机构或行政机构为核心,但市镇设计人所最应注意者乃在住宅问题。因为市镇之主要功用既在使民安居乐业,则市镇之一切问题,应以人的生活为主,而使市镇之体系方面

随之形成。生活的问题解决须同时并求身心的康健。欲求身心健康,不惟要使每个人的居室舒适清洁,而且必须使环境高尚。我们要使居住的环境有促进居民文化水准的力量。我们必须注意到物质环境对于居民道德精神的影响。所以我们不求在颓残污秽的贫民区里建立一座奢华的府第,因为建筑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它必须择邻。我们计划建立市镇时,务须将每一座房屋与每一个“邻舍”间建立善美的关系,我们必须建立市镇体系上的“形式秩序”(form-order)在善美有规则的形式秩序之中,自然容易维持善美的“社会秩序”(social-order)。这两者有极强的相互影响力。犹之演剧,必须有适宜的舞台与布置,方能促成最高艺术之表现;而人生的艺术,更是不能脱离其布景(环境)而独臻善美的。同时,更因人类亦有潜在的“反文化性”,趋向卑下与罪恶,若有高尚的市镇体系秩序为环境,则较适宜于减少或矫正这种恶根性。孟母三迁之意或即在此。

关于住宅区设计的技术方面,这里不能详细的讨论,但是几个基本原则,是保护居民身心健康所必需。

一、建筑居室不只求身体的舒适,必亦使精神愉快;因为精神不愉快则不能有健康的身体。所以居室建筑必顾及身心两方面的舒适。

二、每个民族有生活传统的习惯,居室建筑必须适合社会的方式(这习惯当然不是指随地吐痰便溺一类的恶习惯而言,乃其是指家庭组织,婚丧礼节传统而言)。改变建筑固然可收改变生活之效,但完全不予以适合,则居室便可成为不合用的建筑。

三、每区内之分划(subdivision),切

不可划作棋盘，必须善就地形，并与全市交通干道枢纽等取得妥善的关系，以保障住宅区之宁静与路上安全，区内各部分，视其不同之性质，规定人或建筑面积之比例，以保障充分的阳光与空气。

四、在住宅之内，我们要使每一个居民的寝室与工作室分别，在寝室内工作或在工作室内睡觉是最有害健康的布置。

五、我们要提出“一人一床”的口号。现在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试问其有多少张床？无论市镇乡村，我们随时看见工作的人晚上就在工作室中，或睡桌子，或打地铺。这种生活是奴隶的待遇。为将来的人民，我们要求每人至少晚上须有床睡觉。若是连床都没有，我们根本谈不到提高生活程度，更无论市镇计划。

六、我们要使每个市镇居民得到最低限度的卫生设备。我们不一定家家有澡盆，但必须家家有自来水与抽水厕所。我们必须打倒马桶。因此，市镇建设中给水与泄水都是最重要的先决问题。

有了使人身心安适的住宅，便可增进家庭幸福，可以养育身心健康的儿童，或为强健高尚的国民，养成自尊自爱的民族性。

为达到使人民安居乐业，我们要致力

于市镇体系秩序之建立，以为建立社会秩序的背景。为达到市镇体系秩序之建立，我们要每一个县城市镇都应有计划的机关，先从事于社会经济之调查研究，然后设计，并规定这类调查研究工作，为每一县市经常设立的机关；根据历年调查统计，每五年或十年将计划加以修正。凡市镇一切建设必须依照计划进行。为达到此目的，各地方政府必须立法，预为市镇扩充而扩大其行政权；控制地价；登记土地之转让；保护“绿阴地带”之不受侵害；控制设计样式。凡此法例规程，在不侵害个人权益前提之下，必须市镇得为整个机构而计划之。这不只是官家的事，而是每个市镇居民幸福所维系，其成败实有赖市镇里每个居民的合作。

最后我们还要附带地提醒：为实行改进或辅导市镇体系的长成，为建立其长成中的体系秩序，我们需要大批专门人才，专门建筑（不是土木工程）或市镇计划的人才。但是今日中国各大学中，建筑系只有两三处，市镇计划学根本没有。今后各大学的增设建筑系与市镇计划系，实在是改进并辅导形成今后市镇体系秩序之基本步骤。这却是教育当局的责任了。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本文由梁思成、陈占祥合写于1950年2月。当时印了百余份，分送中央人民政府、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有关单位。——左川注
陈占祥（1916—2001），40年代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获城市规划专业硕士学位，后又读伦敦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博士。回国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营造司正工程师。1949年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企划处处长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总建筑师。“文革”后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建议：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区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的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

为解决目前一方面因土地面积被城墙所限制的城内极端缺乏可使用的空地情况，和另一方面西郊敌伪时代所辟的“新市区”又离城过远，脱离实际上所必需的衔接，不适用于建立行政中心的困难，建议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政府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图1）。

西面接连现在已有基础的新市区，便利即刻建造各级行政人员住宅，及其附属建设。亦便于日后发展。

东面以四条主要东西干道，经西直门、阜成门、复兴门、广安门同旧城联络。入复兴门之干道则直通旧城内长安街干道上各重点：如市人民政府，新华门中央人民政府，天安门广场等。

新中心同城内文化风景区，博物馆区，庆典集会大广场，商业繁荣区，市行政区的供应设备，以及北城，西城原有住宅区，都密切联系着，有合理的短距离。新中心的中轴线距复兴门不到两公里。

这整个新行政区南面向着将来的铁路总站，南北展开，建立一新南北中轴线，以便发展的要求，解决旧城区内拥挤的问题。北端解决政府各部机关的工作地址，南端解决即将发生的全国性工商企业业务办公需要的地区面积。

目的在不费周折地平衡发展大北京市，合理地解决行政区所需要的地址面积和合适的位置；便利它的交通和立刻逐步建造的工程程序。这样可以解决政府办公，也逐渐疏散城中密度已过高的入口，并便利其他区域，因工业的推进，与行政区在合理的关系中同时或先后的发展。

以下分三节讨论：

第一节 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

第二节 需要发展西面城郊建立行政中心区的理由

（一）建设首都行政机关有什么客观条件

（二）旧城区内建筑政府中心之困难和缺点

（三）逃避解决区域面积的分配而片面

的设法建造办公楼，不能解决问题，还加增全市性的问题

(四)在西郊近城空址建立行政中心区域是全面解决问题，是切合实际

的计划

第三节 发展西郊行政区可用逐步实施程序，以配合目前财政状况，比较拆改旧区为经济合理

第一节 必须早日决定行政中心区的理由

政府机构中心或行政区的位置，是北京全部都市计划关键所系的先决条件。

北京不止是一个普通的工商业城市，而是全国神经中枢的首都。我们不但计划它成为生产城市，合理依据北京地理条件，在东郊建设工业，同旧城的东北东南联络，我们同时是作建都的设计——我们要为繁重的政府行政工作计划一合理位置的区域，来建造政府行政各机关单位，成立一个有现代效率的政治中心。

政府行政的繁复的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这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需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如何布置这个区域将决定北京市发展的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时最主要的因素。

更具体地说，安排这庞大的，现代的，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无数建筑在何地区，将影响全市区域分配原则和交通的系统。各部门分布的基础，如工作区域，服务区域，人口的密度，工作与住宿区域间的交通距离等，都将依据着行政区的位置，或得到合理的解决，或发生难于纠正的基本上错误，长期成为不得解决的问题。

行政中心地区的决定，同时也决定了对北京旧城改善的政策。北京的现况有两方面可注意的。一为人口密集于旧城区以内，这有限的土地已过度使用为房屋建造

部分；所应留的公园，空场，树林区极端缺乏，少过于现代的应有比率太多。

二为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不但它们的形体美丽，不允许伤毁，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所以目前的政策必须确定。即：是否决意展拓新区域，加增可用为建造的面积，逐步建造新工作所需要的房屋和工作人口所需要的住宅、公寓、宿舍之类；也就是说，以展拓建设为原则，逐渐全面改善，疏散，调整，分配北京市，对文物及其环境加以应有的保护。或是决意在几年中完成大规模的迁移，改变旧城区的大部使用为原则——即将现时百三十万居民逐渐迁出九十万人，到了只余四十万人左右，以保留四十万的数额给迁入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服务人员，两数共达八十万人的标准额，使行政工作全部安置在旧城之内，大部居民迁往他处为原则。现时即开始在旧市区内一面加增密集的多层建筑为政府机关，先用文物风景区或大干道等较空地区为其地址，一面再不断地收买拆除已有高额人口的民房商店区域，利用其址建造政府机关房屋，以达到这目的（不考虑如何处理迁徙居民的复杂细节，或实际上迁出后居民所必需有的居住房屋的建造问题；也不考虑短期内